

周总理关心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

□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从多年的战乱中逐渐恢复，百废待举，经济拮据，外汇紧缺。但为了不使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周恩来总理关心运筹下，一批批重要法书名画、古钱币、善本古籍等由香港回归大陆，铸就了我国文物事业史上的辉煌篇章。

“三希堂”与“三希帖”

古人有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或“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说。但这里的“三希堂”之“三希”，却是指清内府所藏三件法书名帖。清官修《国朝宫史》卷十三《宫殿》载：“清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因知“三希堂”之命名，乃因晋王氏三帖均度藏于此。

清宫养心殿西暖阁本称温室，曾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书房，度藏魏晋以来一百三十多人的三百多件法书名画。其中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远帖》，乃三希堂度藏中的名品，为历代文人雅士所追捧。清王朝覆灭之后，小皇帝溥仪并未出宫，只是移居故宫北区，且始终不忘复辟之梦。1925年被迫出宫，时《中秋帖》《伯远帖》“二希”则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遂由敬懿皇贵妃将之携出宫禁。后由溥仪抵押在日本人经营的银行。押期将至，却无力赎回。古玩瓷器商郭葆昌将之赎出，否则很可能落入日人之手，流出海外。另一种说法是敬懿皇贵妃携出宫禁后，由其娘家侄孙卖给了古玩瓷器商郭葆昌。1932年的一天，郭葆昌在家宴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酒过三巡，郭葆昌拿出两帖请马衡鉴赏，马衡爱不释手，但又无力收回，只好望而兴叹。其后，郭葆昌还曾多次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交涉，希望“三希帖”能在故宫重聚，使故宫“三希堂”实至名归。然终因财力不支而未能实现。1940年郭葆昌去世，其子郭昭俊继承了二帖，也曾携赴台湾，因估价不协而未果。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辗转各地，最终定居香港，又将之抵押在一个印度人经营的银行，待价而沽。

2019年下半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于香港收购了一批郑振铎与刘哲民、徐伯郊、徐森玉等人的往还信札，然后将之捐赠国家文物局，而国家文物局又将之拨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并于年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凡是国宝都要争取——郑振铎等抢救流失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梳理这些信札并结合其它材料，既能进一步了解周总理是如何关心指导这轮抢救，也能粗略梳理出这些文物流散的大体脉络。

始购郭昭俊的“二希帖”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这“二希”墨宝逃往台湾。在台湾他曾向原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1948年押运古物赴台、后升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表示愿意出售这“二希”帖。庄严亦四处筹措资金，但终未在约定的时限内达成交易。后郭昭俊赴香港做生意，遂将《中秋帖》和《伯远帖》又抵押给一位印度人经营的银行，那位印度人以十多万港币又抵押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抵押期限至1951年11月底。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1951年10月25日的《马衡日记》中记载：“十时半，赴文物局开学委会，修正学习毛泽东思想提纲。（王）冶秋询《中秋》《伯远》二帖历史，谓郭昭俊押在香港外人处，本年十一月底即将押绝，郭无力赎取，拟请公家取赎。嘱致函郭沫若，请其设法。”这就是1951年回购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的起因。

王冶秋、马衡等得知此事后很快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于1951年11月5日向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薄副主任、南行长下达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运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短短140字的指示中，饱含着总理的种种心愿、嘱托和睿智。

总理的意愿十分明确，那就是同意回购两帖。其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外汇拮据；朝鲜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军需也是大笔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显然是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权衡之后做出的郑重决定，是对流失海外珍贵文物回归的高度重视。

但回购流失海外珍贵文物，要在区分文物本身的真伪，如果不慎将贗当真买回，那就不仅仅是资金的浪费，而是鉴定者有失资望，公帑被滥用也失国格。总理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所以要求“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考虑到光负责人未必能鉴定，故要求“派负责人及识者”一同前往，形成行政管理人员与专家一同前往鉴别，确保所购之物为真。这是何等细致入微的至嘱！

郭昭俊毕竟是商人，他的两帖押价到底是多少，不能只凭他一说就信以为真，其中是否有诈骗或抬高，须进行核实，所以指示中还要求找我方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抬高押价之事”，目的是不能受骗。而所需价款，须由我方在港银行与郭昭俊共同商定，经电请北京批准后垫付。而我方拨款，则要在两帖运入内地以后才行拨付。可谓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知道了这些情节，才知道周总理是怎么在日理万机情况下妥善处理这些具体事务的。

郑振铎1951年12月13日致信刘哲民，报告“‘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是年12月底，“二希”运抵北京，重归故宫博物院。为此，总理批拨了50万元港币，实际用了488376元。这是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以重金收购回归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实例。

再购陈仁涛所藏古钱币

陈仁涛（1906—1968）又名长庚，号金匱室主，浙江镇海（今宁波）人。他的祖辈曾是上海杨庆和银楼的四大股东之一，自己亦曾任该银楼的经理。杨庆和银楼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地点在上海县小东门。此后不断发展，屡经迁徙，营业不断拓展，实力雄厚。陈仁涛出身如此豪富的家庭，有条件广搜博采，专嗜收藏。著名的宋拓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宋巨然《溪山图》、元方从邑《武夷放棹图》等，都曾是他的插架之物。上世纪30年代初，得同乡张綱伯指点，又喜好上了古钱币，遂广事搜罗，多位古泉旧藏之家的藏品皆先后入其室。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古币收藏可为富甲一方。他在《金匱论古初集》自序中尝言：“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夥。”其中以“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灿然大备。”特别是古泉币，多逾万种，很多为故宫博物院所未备。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国宝金匱直万”，相传为西汉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时所铸，时在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7）前后。汉代的黄金每斤值万钱，此钱可值黄金一斤。1920年前后首次发现于西安杨家城，仅二三枚，传世极罕。此件乃陈仁涛藏古泉之一。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由沪赴港，其金匱室的珍藏亦编号装箱运至港阜。50年代初，陈氏有意出售所藏钱币，遂请张綱伯作筏，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整批出让给国家，索价港币70万元。

郑振铎得知此事后，于1951年多次致信徐伯郊，告知在港拟成立小组，以徐伯郊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宜。并言陈（仁涛）托张（綱伯）代为出售钱币时，只索价70万元，如今我们出了90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君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索取之价为准。古货币如能在70万元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80万。为此，徐伯郊又找到陈君葆，请他出面帮助办理。1952年9月19日《陈君葆日记》有如下记载：“与伯郊到东亚银行九楼一位姓胡（指胡惠春）的去谈了一会，目的是要替国家购买陈仁涛的一批古钱，他们商量了一次，结果仍要找一位姓金的才能决定去看陈仁涛。这件事当中，也有多少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伯郊想到找我。第一，人民政府要购买这一批东西，却又不让物主知道是政府买，避免来抬高价钱，如果让我露面来作买家的代表人，陈仁涛就只得在暗中摸索了。这个方法可能有效。第二，里边购买外汇，一时款还未汇到这里来，而这方面谈到交易也不得不先给陈以一笔款以坚定他的信心，同时他这批东西也是押在银行里的，拿出来也要手续费，所以这事的结果是胡金才几个人先凑了五万元给仁涛，逐后又添了若干千，这样开始弄好了，然后五点多，胡金才陪同我到浅水湾去访陈仁涛。陈仁涛的一批东西大概是集南北方药雨、张叔纯两藏在一人手上，而又增了他自己所搜罗的若干部分所成。计八大箱，洋洋乎巨观哉！”

陈君葆（1898—1982）字厚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幼就读乡间私塾。11岁随父前往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后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攻读政治经济。1921年毕业，应聘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两年后到吉隆坡任七洲府视学官。“九一八”以后，曾赴厦门、上海、南京考察国情。1934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任冯平山图书馆主任并任中文学院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与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等发起“新文字运动”，推广汉字拼音和平民教育。1941年初，参加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是香港知名学者，爱国

教育家、文学家、宗教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徐伯郊找他帮忙回购陈仁涛藏币，算是知人善任，结果以80万港币商妥办成。1953年8月29日郑振铎致函徐伯郊，称“古币款已汇上，请即与沈君办理手续”。这80万元港币也是周总理批准的。这批珍贵的古币包括历代发行金、银、铜币及纸钞，凡17000多件，1953年回归祖国，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继购陈清华旧藏古籍善本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祖籍湖南邵阳。1894年8月5日出生在扬州。1915年上海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获资助赴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19年学成归国，先后供职于多家银行。上世纪3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古籍善本的蒐藏，并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后不久，陈清华北上拜见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于京华。甫见面，傅先生便笑问：“君非以万金购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自此，陈氏藏书室便以“荀斋”“郇斋”颜之。荀斋财力雄厚，又慧眼识珠，入藏宋元本珍贵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与日俱增。一时江南无出其右者，与北方天津周叔弼自庄严堪藏书双轨并驾，故时有“南陈北周”之誉。1949年，陈澄中移居香港，其珍贵藏书亦随之度藏港阜。

两年后，即1951年，陈氏用钱，遂欲出让部分珍贵藏书的消息不胫而走，美国人、日本人知晓后都想染指收购，使这批珍贵善本流失海外的风险继续加大。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连续致信徐伯郊。1952年12月15日函称：“陈澄中的善本是否可购？”1953年1月10日徐伯郊回函郑振铎，称：“《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已收到，谢了。洋洋大观，无所不有。其中每一本书全是想看的，尤其周、刘二家的书。因为这本目录，更鼓励我尽力争取陈澄中的书。陈的书争取到后，可以说全国藏书家的书全集中于中央了。希望今年国庆日再来一个更大的展览。”信中所言《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指的是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于1952年9月29日举办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而编制的目录。其中不少是藏书家新捐赠的善本秘籍，十分抢眼。郑振铎给他写信时寄送了一部这个展览的目录，所以他信中才说“《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已收到”云云。也正是因为这本目录中所著录的某些珍本秘籍，鼓舞着徐伯郊先生尽力去争取陈澄中的藏书，才有陈氏藏书分批购回的胜举。

陈澄中的藏书中，宋版《荀子》颇负盛名。当年傅增湘与陈澄中见面就笑问“君非以万金购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傅增湘先生为什么会开这类玩笑，因为它有历史根据。史载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尝疏请由崇文院校定《荀子》《扬子》《文中子》，送国子监下杭州镂板。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刻成，是为监本《荀子》之祖。金人破汴，书籍及书籍板片被金人捆载北还，故宋室南渡后，已无板片可重刷，只得民间搜讨旧本翻雕。南宋淳熙八年（1181），钱佃在江西，唐仲友在浙江台州，同时据熙宁监本翻刻《荀子》。傅增湘以为陈澄中重金所购即熙宁监本，故有上述笑谈。然唐仲友翻刻时“悉视熙宁之故”，即行款、字体、版式等，皆保持熙宁本旧制，故台州本《荀子》亦向为藏书家所珍重。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本来自陈澄中荀斋，故一般多认为它即是唐仲友台州本，实则连台州本也不是。检此本讳字，“敦”“廓”二字皆已缺笔，显避南宋光宗赵惇、

宁宗赵扩嫌名之讳。且此本刻工亦异于唐本和钱本，因知此本绝非唐本或唐本重修之本，更非钱氏江西漕台之本，而是南宋宁宗时重刻之本。但版式格局，仍不失监本規制，当属监本系统，且海内仅存，至为罕觐。清顾广圻跋曾称：“今年又从艺芸书舍借此印本，对勘订正影抄之误。细检避讳，不特在熙宁、元丰后，且在淳熙之后多年，或版有修改致然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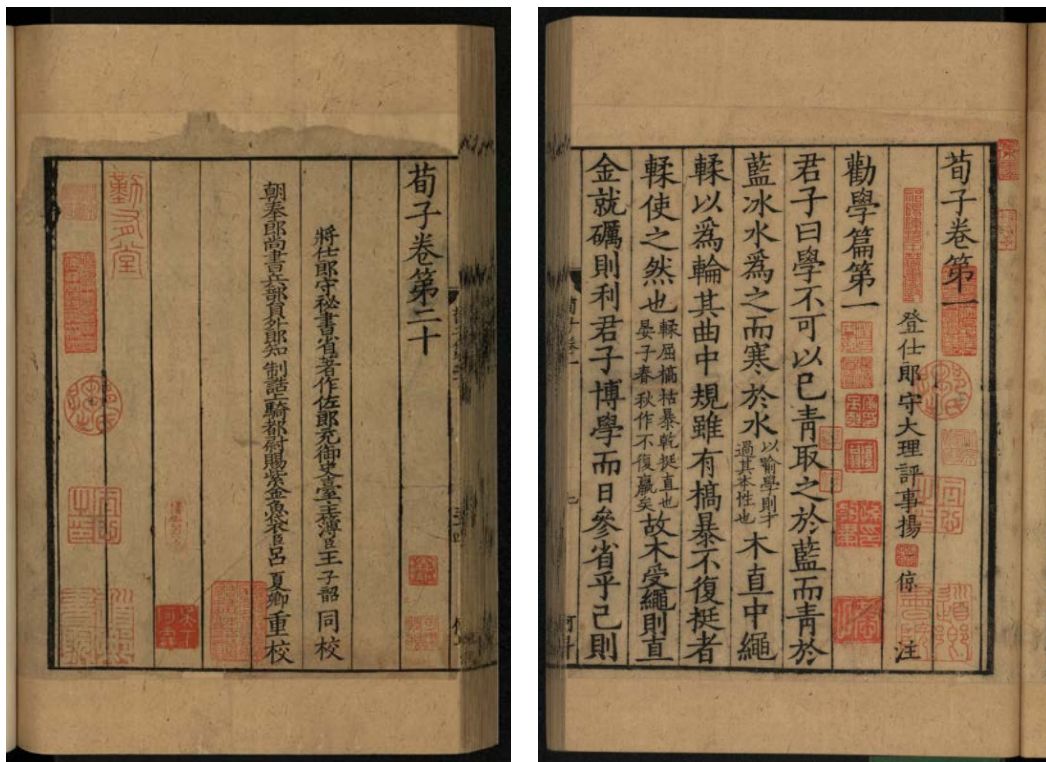


图1 《荀子》宋刻本

1953年3月27日，郑振铎再函徐伯郊，谓：“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设法购到。国内收藏，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是年8月29日，郑振铎又致函徐伯郊，追问：“陈君的宋元善本事已进行否？究竟要多少钱？恳即办为荷。”直到1955年此事才得以解决。1955年5月28日，郑振铎曾致函张元济，言及“得森玉先生函，知先生时以陈澄中的善本书能否收归国家所有为念，这件事已进行了两年多，最近方才解决，已在港点收完毕。从此世綵堂的韩、柳文，蜀刻的唐人数集，以及许多宋元善本、明抄黄跋，均得度藏北京图书馆了。从此，善本图书的搜集工作，除了存于台湾和美国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1955年7月30日，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致函徐森玉，报告“陈氏荀斋藏书，已于日前移到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前后延宕了三年，陈澄中荀斋第一批古籍善本藏书83种，入藏于今国家图书馆。其所用外汇，还是周总理批准的。被誉为“无上神品”的南宋贾似道门人廖莹中世綵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宋刻递修本《汉书》，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东塾校刻的二家注《史记》，蒙古宪宗六年（1256）碣石赵衍在北京校刻的唐李贺《歌诗编》，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元措编刻的《孔氏祖庭广记》等，都是这批书中的白眉。“为了保存好这批空前集中的国宝珍籍，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分馆）在1956年调整了善本书库的藏书，将原来善本书库布置得恰如宛委洞府，琅函满架，书香拂面，卷帙盈目。”（丁瑜《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

1963年，陈澄中为移居美国而要筹措资金，荀斋主人再次转让部分珍贵藏书的消息又传到了北京。这时，郑振铎副部长已于1958年在出国途中飞机失事，因公殉职。而继他之后出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文物古籍亦具真知灼见，深悉荀斋藏书的品位质量，因而对其流向十分关注。他率由老局长郑振铎之旧章，一方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争取外汇，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会同行政管理人员南下广州，与陈澄中代表接洽收购事宜。赵在1955年洽购荀斋第一批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清刻本和抄校稿本，因而提出全部收购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全部收购之议未果，却以20万元港币购回珍贵古籍善本18种，碑帖善拓7种，凡25种102册。以书名斋的宋版《荀子》、宋拓柳公权书丹的《神策军碑》、宋拓始刻于五代后蜀广政元年（938）的《蜀石经》、宋蜀刻唐人文集、开本宏朗版心小巧的元大德九年（1305）湖南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校刻的《梦溪笔谈》等精品，都是这次购回的。

1965年11月3日，这批珍本善拓运抵北京。不久，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3号楼会议室，为这批书举办了一次小型陈列，邀请杨秀峰、徐平羽、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社会名贤前来鉴赏，而终极目的是要请周总理莅临，过目赏鉴。然总理日理万机，因事未到，康生却以行家姿态前来一一翻阅。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总理办公室电告王冶秋局长，谓总理要看宋拓《蜀石经》。当天晚上，由王冶秋、丁瑜二人携书进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游泳池到西华厅，由王冶秋交给了值班秘书。又过不久的一天晚上，赵万里等又奉命将这批书送至中南海紫光阁，陈列在几案上，请总理鉴赏这批瑰宝。看书过程中，边看边议论，当看到宋拓《蜀石经》时，指着签题问，此书题签为谁所写，是不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赵万里先生圆满作了回答。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拓《蜀石经》篆字题签尤存，秀气灵动，雅致不俗。右上钤朱文“即此是学”，左下钤朱文“宣”、白文“统”连珠印鉴。表明签题确为溥仪手笔。（图2）



图2 宋拓《蜀石经》篆字题签

上述回购表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前后延时十有五年，四批重要文物的陆续回归，不仅丰富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机会研究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更让我们感谢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和对流失海外珍贵文物回归的关心。

二十年之后的1985年12月12至22日，“中国书展”在香港展览中心隆重举办。我策划制作的“中国古代书籍史展”同时协助展出。这个小型展览，摆在“中国书展”右侧前端，

展室不算很大，但将展品展陈之后，还显得很精致。展览内容涉及的历史知识含量较大，有文字说明，实物陈列、图像描述，加之简明扼要的讲解，所以收效很好。参观者有香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小学生，整班整班由老师带领而来。也有学界名人，乃至行家里手特意前来观展。一天上午，我正出恭小解，厅中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儒雅之士，看完展览在厅中说，这是行家搞的展览，其人是否来港，若也来港，很愿见上一面。正说着，我已回厅，赶紧上前握手施礼，自道姓名，对方也自报我是徐伯郊。徐伯郊！我久闻其名，故再次握手，自叹晤面甚晚，今日始见。

徐伯郊（1913—2002），字文桥，祖籍浙江吴兴。著名文物鉴定泰斗徐森玉之子。自幼受家学影响，文物素养极为深厚。尤精于古代书画和古籍版本鉴定。1932年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日语，后考入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1937年回国度假，正遇“七·七”事变，遂愤然留在国内。先后在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供职。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他自己则酷爱文物和珍贵典籍，成为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1951年受国内有关方面委派，成为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经他手，将已流落在香港的“三希堂”中的《伯远帖》和《中秋帖》及《韩熙载夜宴图》抢救回归祖国，使北京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有“二希”。陈仁涛所藏古钱币1953年回归祖国，陈清华荀斋两批藏书分别于1955和1965年从香港回归，也是徐先生斡旋经办的结果。这些事我不全然知道，但梗概以及用事之人多少还知道一些。故当先生道出自己姓名时，实在高兴有缘在此相晤，遂就势与之谈起陈清华藏书的回归。先生也越听越高兴，遂邀我一道共进午餐。

餐中边吃边谈，扯到了陈清华第二批书中最有名的宋刻《荀子》绝非唐本或唐本重修之本，更非钱氏江西漕台之本，而是宁宗时重刻之本。但版式格局，仍不失监本規制，当属监本系统，且海内仅存，至为罕见。另外《友林乙稿》也绝非宋版，而是清翻。先生连连点赞，表示我们研究得很深很细，应该如此。好在同行漫谈，相聚甚欢。先生也旧事重提，讲他们当年秘密收购的情节，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使我深受感动，也验证了上述信札中涉谈的事实。



图3 李致忠先生与嘉德拍卖公司一行合影

由于陈氏两批藏书都先后归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且保管精善,为陈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隔40年,2004年3月,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拓晓堂同志如约来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与荀斋后人陈国琅先生相见,面谈他从父亲陈清华手里继承的部分藏书回拍问题,结果洽谈成功。拓君原来乃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人员,后虽供职嘉德拍卖公司,但对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建设始终有割不断的情怀,故这批书从大洋彼岸运回北京以后,拓君便与公司协商,力主不经拍卖而整体转让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亦闻风而动,先请部分专家对这批书进行初步鉴定,确认价值,紧接着便向财政部提出专项报告,最终以国家文物局所掌管的回购流失海外珍贵文物专项管理资金采购之,入藏于国家图书馆。(图3)

这批书一共24种,其中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册、宋景定二年(1261)安吉州归安陆道源刻本《妙法莲华经》、宋宝祐明月堂刻本《大慧禅师年谱》、宋刻巾箱本《山堂考索》《古文苑》,元刻本《杨仲弘诗集》《范德机诗集》《说苑》,明活字印本《欧阳文忠公归田录》《曹子建集》等,都是一级古籍,版本上乘。

陈清华哲嗣陈国琅先生,于2004年不但整体转让了他手下的藏书,还将其父当年的藏书印鉴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并在致国家图书馆亲笔信中云:“中国国家图书馆将我保存先父陈清华在海外部分的善本书全部购藏,我深为欣慰……保护民族文化典籍,是父亲藏书的终身至高意愿。家境窘困之时,父亲无奈出让部分藏书,也是尽可能以国家为先为重……如今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想的妥善归宿。”

从1955年至2004年,半个世纪之内陈清华荀斋珍贵善本藏书125种分三批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当中饱含着收藏者陈氏父子两代人的殷殷爱国之情,饱含着许多志士仁人的热心帮助,更饱含着敬爱的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和主管领导者的责任心,反映了历届政府对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强烈意识。今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专门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深信无论是流失海外古籍的回购,还是对现有古籍的维修维护,都会出现令人鼓舞的新局面。